

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nd
Family Capital



蒋逸民/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nd Family Capital

蒋逸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社会学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

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

著 者 / 蒋逸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教材事业部 (010) 65281150

电子信箱 / jiaocai@ssap.cn

项目负责人 / 刘德顺

责任编辑 / 秦静花 谢蕊芬

责任校对 / 邓晓春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6.4

字 数 / 282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492 - 9 / D · 0210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问题的陈述	3
二 研究的意义	4
三 主要概念的定义	5
四 本书的篇章结构	6
第二章 有关家庭环境研究的文献综述	8
一 家庭环境的结构维度	8
二 家庭环境的过程维度	12
三 家庭环境的资本维度	16
四 发展中国家的家庭环境	18
五 中国城市的家庭环境	19
六 本章小结	22
第三章 中国城市家庭环境的概念框架	24
一 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	24
二 理论视角	36
三 概念框架和假设	50
四 本章小结	55
第四章 研究方法论	57
一 研究设计：结合方法的使用	57

二 定性访谈	58
三 问卷调查	61
四 本章小结	69
 第五章 定性分析的结果及其解释	70
一 访谈抽样及其程序	70
二 访谈工具	71
三 访谈策略	72
四 对访谈资料的分析	73
五 资料分析的“三角互证”	94
六 本章小结	95
 第六章 《家庭环境问卷》的设计	96
一 对现有问卷的评述	96
二 《家庭环境问卷》的设计	98
三 预调查的过程	103
四 对问卷的进一步修改	112
五 用于主调查的问卷	113
六 本章小结	117
 第七章 《家庭环境问卷》的心理测量特性	118
一 《家庭环境问卷》的信度	118
二 社会资本量表的结构效度	119
三 社会资本分量表的相关分析	123
四 本章小结	124
 第八章 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126
一 受访者的特征	126
二 高低学习成绩学生的特征	137
三 性别比较	142

四 本章小结	145
第九章 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	147
一 相关分析	147
二 多元回归分析	151
三 本章小结	157
第十章 讨论、结论和建议	158
一 本研究的总结	158
二 讨论和结论	162
三 对教育改革的意义	172
四 本研究的局限和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174
附录 1 半结构访谈提纲	176
附录 2 受访者情况	179
附录 3 转录的访谈资料	183
附录 4 《家庭环境问卷》(学生)	246
附录 5 《家庭环境问卷》(家长)	263
附录 6 问卷调查的人口统计特征	287
附录 7 家庭非学习性资源	288
附录 8 课外非学习性活动	290
参考文献	292
后 记	318

第一章

绪 论

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Galton（1869）就开始探讨英国家庭因素和获得显赫地位之间的关系。从那时候起，研究者致力于弄清家庭特性和孩子智力表现之间的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以来，对家庭因素和学校教育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成为教育研究，尤其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参见 Boocock, 1980; Rior-dan, 1997）。

尽管孩子的学习成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尽管在遗传特征和环境影响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上尚有争论，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环境强烈影响了孩子的认知和社会能力。Bronfenbrenner（1986）提出，家庭、学校、社区这三个主要环境系统影响了儿童的发展。在探讨学习成绩的主要决定因素的早期研究中，《科尔曼报告》（Coleman, et al., 1966）以及 Mosteller 和 Moynihan 对《科尔曼报告》的再分析表明，家庭背景比学校有关变量更好地解释了学生学习成绩的差异。自《科尔曼报告》发表以后，西方国家出现了大量有关家庭背景和学校学习表现之间关系的研究论著。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家庭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相当大的影响（Kellaghan, 1997）。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研究者在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家庭影响的研究中不断改进概念框架、测量指标和研究方法。White（1982）对大约 200 个有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和孩子学习成绩的

研究进行了再分析。他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从 0.10 到 0.80 变化不等,显示出家庭影响的差异很大。后来的研究引入了家庭过程变量,如父母参与;以及家庭资本变量,如文化资本 (Bourdieu, 1986) 和社会资本 (Bourdieu, 1986; Coleman, 1987), 提高了家庭影响的解释力。

在上述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如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路径分析 (Path Analysis) 或模型 (Saha, 1997; Kellaghan, 1997) 来探讨家庭环境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他们主要用标准化的常模参照考试来测量学生的学习成绩,但也有研究者使用了平均学分积、教师打分以及其他非标准化的考试来测量学生的学习成绩 (Saha, 1997; Kellaghan, 1997)。与此同时,定性分析方法作为一种可选择的方法在家庭影响的研究中加以使用。

尽管家庭特性一般比学校特性更重要,但这一事实会因国家、学校以及年级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 (参见 Eckstein, 1982)。研究发现,不发达国家的家庭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要复杂一些,比如,有的研究没能证明家庭有关的因素对学校表现的积极影响 (Heyneman & Loxley, 1983), 而有的研究却发现,家庭背景在城市学校比在农村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影响更大 (Haron, 1977)。

近几十年来,对家庭环境与不同年龄或年级孩子的智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已有初步认识 (Levine, 1992)。但是,有关中国城市家庭对学生学习成绩影响的研究,特别是对处于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巨大变革时期的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影响的系统研究还不多见。

当代中国正处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科技发展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并给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带来很多变化。科技创新给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一起分享的时间、信息渠道、家庭子女数量以及就业机会带来了明显的影响。比如,因为有了电视机、移动电话、家庭电脑和网吧,城市居民

接收信息和休闲的方式有所改变。而这些也为城市居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他们提供了有关社会、历史、科学发现以及宇宙奥秘的新知识和新见解。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推进城市化、变革体制机制，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过去基于“政治身份”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步让位于基于“职业”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分化、演变，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越来越多，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认同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不断加大，它们之间的流动也越来越频繁。

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居民就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求得生存并得到发展，用人单位都要求员工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最好有大学以上的教育背景。高学历者有更多的择业机会，大学文凭对获得心仪的工作岗位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重要（参见 Lin, 1999）。当然，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转型在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创造就业机会、激发高学历的社会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单位调配资源作用的降低、传统产业失业人数的增加、离异家庭的增多，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等社会现象。因此，中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尽管面临科技、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社会关系对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仍然是重要的。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尽管传统社会关系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Liang, 1949）。因此，将家庭社会资本概念引入与学习成绩相关的中国城市家庭环境的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 问题的陈述

本研究探讨了南京家庭环境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具体来

说,本研究探讨了家庭环境的一些方面,如社会经济地位 (SES) 和社会资本与南京市中学生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目的是:①探讨与学习成绩相关的南京家庭环境的维度;②探寻学生学习成绩的家庭影响因素,检验社会资本在解释学习成绩差异中的有效性;③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资本对学习成绩影响的相对差异。

图 1-1 是家庭环境与学生学习成绩关系的简化模型。这个模型来自以前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 (Keeves, 1972; Scott-Jones, 1984; Coleman, 1966, 1988)。在这个模型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受到两种家庭环境变量的影响:其一是“家庭结构变量”,如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资源等;其二是“家庭过程变量”,如家庭信念和互动行为 (社会资本) 等。尽管这两个家庭环境变量在分析问题时分开了,但它们在现实中是密不可分的。之所以在模型中把它们分开,是因为家庭结构静态或消极被动的特性,以及家庭过程动态或积极主动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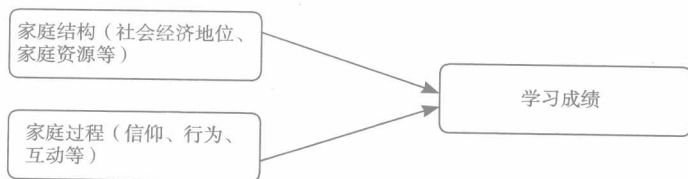


图 1-1 家庭环境影响成绩的简化模型

二 研究的意义

本研究应用“社会资本”概念对南京城市中学生家庭环境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理论意义在于:①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资本”概念的测量指标,进一步深化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提供一个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把“社会资本”概念用于教育社会学的实例,以便更好地理解西方社会理论概念在非西方文化背

景下的可能应用；②目前国内对学校表现受家庭环境影响的研究还不多，本研究注重参照、吸收国外最新的理论和研究模式，对南京城区中学生家庭环境作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空间；③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中出现的误差，以保证调查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以下几点。①在为青少年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结合教育网络的过程中，为家长的家庭参与、社区参与和学校参与提供实证研究的依据，有利于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②本研究对南京市城区中学生家庭环境的现状做出分析和解释，为解决家庭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切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的对策，对南京城区家长未来参与模式和策略提出建议。③本研究将为深化教育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使学校的管理者和教育行政部门认识到，有效地调动家长这一宝贵资源也会促进和改善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行为，从而提高整个学校的效能。④本研究将回答社会学家、教育家、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家庭环境是否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产生影响”，“哪些家庭因素可以改善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校的效能”，“家庭社会资本是否是解释城市学生学习成绩差异的一个有效工具”，等等。

三 主要概念的定义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概念是家庭环境和学生的学习成绩。

家庭环境 与学习成绩相关的家庭条件、动力和要素的综合体，如家庭的物质条件、家庭的互动、父母的态度等。在本研究中，家庭环境涉及家庭结构维度（如家庭的人数、父母的婚姻状况、父母的就业情况、父母的兼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教育资源和非教育资源）与家庭过程维度（如家庭内社会资本和家庭间社会资本）等。

社会经济地位 主要由职业、教育、收入和政治党派决定的家庭成员在社会科层结构中的位置。在本研究中，它涉及父母的职业、最高教育水平和党派成员身份。

家庭社会资本 成人与儿童之间或成人之间的一种支持关系。在本研究中，它涉及家庭内社会资本和家庭间社会资本（参见 Coleman, 1997: 623）。

家庭教育资源 家庭可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来源，比如：家庭书籍、报纸、字典、电脑、互联网、百科全书等。

家庭非教育资源 家庭可获得的消费品。在本研究中，它涉及家庭基本的物质享受，如电视机、电话、空调、照相机等。

学生的学习成绩 城市中学生在语文和数学考试中的分数。在本研究中，它涉及南京市中学生在全市语文和数学统考中的分数。之所以用语文和数学来代表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因为它们是中学的两门核心课程（详见本书第四章），而且大多数国际研究者经常用语言和数学的成绩来测量学生的学校表现。更为重要的是，语文和数学考试已在南京实行多年，语文和数学的统考成绩可看成是标准化的考试成绩，是学生学习成绩可信和有效的测量。

四 本书的篇章结构

第一章提出本研究的研究问题、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意义。第二章对有关家庭环境结构维度、过程维度和资本维度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历史评述，并对不同国家家庭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文献进行了评述。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发现了中国教育社会学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第三章提出了本研究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将家庭、“关系”和单位等中国文化特有的东西置于强调互动、地位群体和家庭社会资本的生态模型中。该章最后从概念框架出发提出了研究问题 and 研究假设。第四章概述了本研究的研究设计 and 方法，论证了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策略，并论述了本研究

所使用的定性访谈和定量问卷调查之间的关系，以及信度和效度的测量。第五章是访谈的结果以及对访谈结果所作的诠释。该章描述了定性研究的设计，半结构访谈的内容和策略，以及对访谈数据的分析和解释。

第六章概述了设计《家庭环境问卷》(FEQ) 的五个阶段，提出了家庭背景 (FB) 量表、家庭内社会资本 (WFSC) 量表以及家庭间社会资本 (BFSC) 量表的结构和内容。接下来的第七章描述了这三个量表的统计测量的特征 (如效度和信度)。第八章是问卷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对样本概貌以及语文和数学考试高低分学生的特性进行了一般性描述。第九章探讨了学生学习成绩的预测变量，并确定哪些因素能成功地预测语文和数学成绩。第十章是对本研究成果的小结，对定性和定量研究的主要发现进行了综合评述，包括本研究的结论、对未来研究的建议，以及本研究对教育实践的意义。

第二章

有关家庭环境研究的文献综述

家庭是影响孩子学校表现最重要的学习环境（Coleman, 1966）。经常用来预测孩子学校表现的家庭环境的指标有：①与父母的个人关系（如态度和信念的一致性）；②父母和孩子之间互动和沟通的数量和质量；③孩子之间的个人关系；④孩子与父母一起活动的类型和变化（如工作、阅读、购物、看电视）；⑤孩子在没有家庭成员看管或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被允许独自从事活动的类型和数量（如独自玩耍、同辈群体的接触）；⑥父母对学校的态度、对孩子学校表现的兴趣，以及与学校或老师的联系；⑦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参见 Guiforl, 1967；Vernon, 1969；kahl, 1994）。

这一章有选择地评述了不同家庭环境维度对孩子学习成绩影响的文献。文献评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家庭结构维度、家庭过程维度、家庭资本维度、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背景、中国的家庭背景等。

一 家庭环境的结构维度

结构维度是指家庭结构的静态特征，即“家庭是什么”，比如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SES）和家庭的规模等。在过去的40多年里，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寻求发现和认知发展与学校成绩直接

相关的家庭环境特征 (Levine, 1996)。从《科尔曼报告》(Coleman, et al., 1966) 开始的许多研究表明, 家庭学习环境解释了学习成绩很大部分的差异 (Greenwood & Hickman, 1991)。1965 年秋, Coleman 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 采用问卷调查法, 对全美约 4000 所公立中小学教师、校长、地方教育官员, 以及一、三、六、九、十二年级 5 个年级约 645000 名学生进行调查, 收集有关父母教育、家庭兄弟姐妹人数、家庭的教育支持, 以及语言能力、阅读理解、数学、常识和非语言能力等课程测试方面的数据。Coleman 坦言, 研究兼具政治与理论的目的, 希望根据学校差别而导致成绩差别的事实来推动学校资源的均等化。1966 年 10 月, 经过 1 年系统和深入的实证调查分析, Coleman 研究小组发表了题为《教育机会的均等》综合性研究报告, 这就是著名的“科尔曼报告”。

出乎意料的是, Coleman 发现, 学校人员花费、实验室花费、图书馆花费和学校运作花费等学校因素基本与学生成绩无关, 而家庭背景因素与学生成绩高度相关。他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

- ①各个年级少数民族裔学生 (亚裔美国人除外) 的考试成绩低于白人学生的成绩, 成绩差距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呈扩大的趋势。科尔曼 (Coleman, 1966) 写道: “除亚裔外, 少数民族学生比白人学生更无信心确认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环境和未来。” (p. 23)
- ②少数民族学生成绩不佳可用学校以外的因素来解释, 其中主要是家庭因素, 如父母的教育程度、贫穷及其他环境因素。
- ③家庭背景因素造成学生学习成绩的差异最大, 大约 1/2 到 2/3 学生成绩的差异可用家庭变量, 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变量来解释 (Coleman, et al., 1966)。

《科尔曼报告》挑战了有关学校和教育的传统观念, 对美国政府、学校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Mosteller & Moynihan, 1972)。当然, 报告出台后, 也有些对其方法、结果和解释的批评意见。归纳起来, 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①Coleman 没有进行纵向研究, 也没有用未入学的儿童作为参照组来进

行对比研究；②研究者从学校获得的信息不一定完全准确，例如，有关化学实验室是根据学校校长的回答来确认其有无；③研究者几乎没有收集关于学校社会系统的资料，也没有观察教室里实际进行的教与学过程，而这些对学生的成绩可能有影响；④Coleman 假设非学校（家庭背景）因素在因果上先于学校因素，因而在评估学校和非学校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时，将所有达成一致的或困惑的变易量都归于非学校因素，导致了保守估计学校因素所解释的变易量；⑤Coleman 没有测量学校间所有变量的可能来源，这可能模糊了同一区域的学校之间和各学校之间的巨大差异（Mcpartland & Karweit, 1979；Karabel & Halsey, 1977）。尽管如此，试图驳倒 Coleman 结论的努力并不成功（Mosteller & Moynihan, 1972）。Coleman 的发现已被其他 100 多个调查反复验证，虽然结果有些差异，但 Coleman 的一般结论仍得到了支持，他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调查被称为全球三大教育不平等研究报告之一，他所做的研究也被看成是大规模和标准化实证调查的典范。

在关于家庭和学校特征影响学生成绩的后续研究中，Jencks 和他的同事（1972）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比学校因素更能说明学生学习成绩的差异。他们发现，美国学校对消除学生学习的平等几乎无所作为，而家庭背景却解释了一半以上学生学习成绩的变易量。纽约州教育部（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1973）的评论也表明，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他们的在校表现产生持续的影响。在大多数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中，社会经济地位是显著的变量。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家庭背景基本上用家庭结构变量，即“家庭是什么”的变量来测量，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阅读材料、家庭规模等（参见 Boocock, 1980）。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标通常包括父母的收入、父母的教育水平和父母的职业。Kiesling（1969）分析了纽约州 97 个地区的六年级学生的调查资料，发现父母的职业与数学成绩呈正相关。Katzman（1971）在对波士顿地区 56 所小学的研究中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他的结论表明,白领工人的百分比与数学和阅读成绩呈正相关。Perl (1973) 对 1767 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十二年级男生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学生的家庭收入与成绩相关。Stockard 和 Lang 的研究工作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他们调查了 570 名高中生,发现学生的社会阶级对学生总平均成绩和英语成绩有相当强的影响。以上的研究成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成绩相联系。

Levine (1996) 解释了为什么社会经济地位会对孩子的学习成绩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认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会营造不同的环境(例如,中产阶级家庭通常选择住在最好学校的附近或者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而不同的环境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孩子的智力发展和学习动机,他们的孩子会或多或少地为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做准备。随后有关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习成绩关系的研究发现,最能预测成绩的一个单项指标是家庭所存有的阅读材料数量。Mullis 和 Jenkins (1990) 分析了不同年级学生的资料,发现家里阅读材料少的学生的成绩要低于家里阅读材料多的学生。全国教育进步评估 (NAPE) 的资料也表明,阅读材料的多少和学生阅读熟练程度呈强相关,家中有字典、25 本以上书以及多本杂志的学生的平均阅读熟练水平要比父母教育水平相同但家里阅读材料少的学生高出大约 15 个百分点(参见 Levine, 1996)。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电脑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个人电脑可以帮助人们迅速获取世界各地的知识和娱乐资讯,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家庭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 (Levine, 1996)。尽管个人电脑越来越重要,但有关家庭电脑对孩子学习成绩影响的研究却不多。Cambell (1989) 提出“在家接触电脑可能会影响学生对电脑的愉悦程度”,而 Sutton (1991) 发现,女生显然很少有可能使用家庭电脑。Siann 和他的同事 (1990) 指出,男生显然更有可能把自己描绘成校外电脑的常用之人。在一些场合,孩子可能把电脑仅用来玩游戏。然而, Ager (1998) 主张应该鼓励孩子用电脑去从事阅读和做家庭作业